

葛 天 氏

黄 百 魁

相传我国远古时期，在有巢氏、燧人氏之后，又有葛天氏（袭伏羲之号）。据清乾隆十二年、民国十九年《长葛县志》载县名的来历：“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。后人思永其泽，故名。”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记述了他“治世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”的政绩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载：“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阕：一曰载民，二曰玄鸟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奋五谷，五曰敬天长，六曰达地功，七曰依地德，八曰总万物之极。”“载民”的“载”当“始”字讲。“玄鸟”传说是燕子，《诗·商颂·玄鸡》“天命玄鸡，降而生商”说，殷商的始祖契是由他的母亲简狄吞燕卵而生，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。以上似乎是歌颂祖先的由来。“遂草木”的“遂”作“育”讲。“奋五谷”的“奋”作“美”讲。这首古乐篇总的说来，是反映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信仰的。它

有歌有舞。“投足”是迈着小步的“舞姿”，手里拿着牛尾，边跳舞边唱歌，象征着耕作的动作。由此可以看到原始时代的文艺活动和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联系，也说明自古以来文艺都是来源于生产劳动的，是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

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

长 葛 钟 氏

陈 平

长葛县历史悠久，民风纯朴，地势平坦，土质肥沃，位居中原腹地，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域。历来人物荟萃，尤以“三钟”——钟繇、钟会、钟嵘为最，另有巾帼钟琰，更属姣姣。

钟繇，字元常，东汉颍川郡长社（即今长葛）人，生于桓帝元嘉元年（公元151年），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（公元230年），寿七十有九。长葛钟家，那时是颍川郡的名门著姓。繇是大教育家钟皓的孙子。“钟皓有笃行精于诗律”。他热心教学，皇帝请他做官“九辟公府皆不就”，而隐避密山（今河南密县境）教学，“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”，他的学生可谓多矣。钟繇的父亲钟迪也很有学识。钟繇生长在这等书香门第，加上聪明好学，文化素质出众，汉末举孝廉，官侍中。建安二年（公元197年），曹操担心袁绍进关攻中。荀彧对曹说：“侍中繇有智谋，若属以西事，公无忧矣。”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推荐，上表汉献帝：

“以侍中守司隶校尉，持节督关中诸军事。”之后，任尚书仆射，封武亭侯，复拜太傅（三公之一），封定陵侯。钟繇之所以被人尊重，并不只是因为他官高位显，主要除他的学识渊博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特别精美，是汉魏著名的书法家。他勤学苦练，长葛老城城内至今还有长六十米，宽三十米的水池，被称谓“钟繇洗砚池”的古迹。解放前还残存着破败的亭台，虽非钟繇时代的原物，但和长葛后河乡的“葛仙池”同为名胜古迹，载于县志。书圣王羲之对钟繇评价说：“顷寻诸名书，钟、张（即钟繇、张芝）信为绝论，其余不足观。”又说他“吾真书过钟，而草故不减张。”梁武帝陈霸先也曾说：“钟繇书，如云鹤游天，群鸿戏海。行间茂密，实亦难过也。”这个评价也够高了。说他的字“如云鹤游天，群鸿戏海”。唐朝书法家张怀瓘说：“钟繇隶书入神，八分（汉字书体的一种，亦称分书）入妙。”汉朝流行的书体是隶书，人称“汉隶”。当时还有一种八分体，钟繇都写得“入神、入妙”。南宋戴复古，在“求先人墨迹呈黄季文诗”中有：“髣（仿）、髣（佛）钟、王体，吟

句更豪放。”他在夸奖黄先人的字和钟繇、王羲之的字差不多。钟繇、张芝、胡昭三人都是汉魏时代的著名书法家，胡昭是钟繇的同学，他们都跟刘德升学书法，胡昭的字写得肥胖些，钟繇的字写得略瘦些，人谓“胡肥钟瘦”，其实是夸奖这些肥字和瘦字都很精美。历代书法著作常常把“钟胡”（即钟繇、胡昭）、“钟张”（即钟繇、张芝）联系在一起，还把钟繇与王羲之的字相提并论，称“钟、王”。钟繇终生酷爱书法，而且他没有把书法停留在“隶书入神、八分入妙”的境界里。他在隶书、八分书的基础上创出了楷书，现行的正楷书法，实由钟繇开始。有人说正楷的创始人是王次仲，但至今仍无实物可考，只是一种说法而已。今人柳傅度先生一九六二年编写的“欧体九成宫标准习字帖”，把钟繇列为汉字书法七大正楷家（钟、王、颜、欧、柳、赵和唐驼）的头一名。他的正楷书法有实物存在，如“宣示表”、“力命表”等。钟繇的“隶书入神、八分入妙”是来之不易的。他跟刘德升学书法，在外十六年未曾回家一次。他死前还对他的儿子

说：“吾精于学书数十年，读他书终未尽其学字”；“平时与他人闲谈，常用物画地长数步”；卧床休息时，用手指在被上练字势，把被戳成窟窿。历代皇室也很重视他的书法，如南宋“绍兴国子监本”、“淳熙本”，明室“肃府本”等书法字帖中，都搜集有钟繇的字在内。

钟繇是汉末魏初封建社会上层建筑里的显官要员，不能说他在政治上是休明的；但他的书法出众，自古至今被人们所喜爱。他是正楷最早的创始人之一，变汉隶为正楷，这在书法学术方面作出了贡献。用楷书缮写文件，比用隶书缮写就方便多了，而且也很好看。应该说钟繇在这方面是有一定功绩的。

钟繇的儿子钟会，字士季，魏志钟会传说他“……敏惠夙成”、“精炼名理”。这就是说他很聪明，成熟的比较早，对事物善于明辨推理。他累官督都徐州、荆州诸军事、司徒等职。他才智过人，给司马兄弟（司马师、司马昭）出过不少成功的主意。诸葛亮死后，蜀将姜维继续伐魏。景元二年（公元二六一年），司马昭拟大举伐蜀，多数文官武将不同意，独有

钟会竭力赞成。司马昭命钟会为征西将军，督都关中。钟会统十万兵马，分三路前进：一路由斜谷；一路由驼谷；一路由子午谷直趋汉中。司马昭又命邓艾统三万兵马，自狄道入沓中牵制姜维；命诸葛绪统三万兵马出祁山占领武卫桥头，绝姜维退路。钟会长驱直入，占领了阳平关。邓艾心怀忌妒，唯恐大功归于钟会，他放弃牵掣姜维的任务，出人不意的从山势险峻、无兵把守的阴平避道直趋江油，由江油迅速进取涪城，再由涪城攻战绵竹。守将诸葛瞻（诸葛亮的儿子）力战阵亡，绵竹失守。懦弱无能的蜀主刘禅不战而降，三足鼎立的西蜀从此灭亡。捷报传到洛阳，司马昭命邓艾、钟会搬师回朝。司马昭的为人，正如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私下议论的那样：“司马昭居心叵测，路人皆知。”他既想篡夺曹魏皇权；又猜忌有才能的文官武将。钟会心里明白，一旦搬师还朝交了兵权，随时都有“狡兔死，走狗烹”的可能。他不得已而心怀异志，想占据四川独立为王。他的心事被姜维看破，姜维乘机勾引，私下密谋杀邓艾，然后起兵成都。可叹钟会“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”，未防机密泄漏，被部下反对者乱

刀砍死，空落得“背叛朝廷”的罪名。其实皇帝曹焕是个活傀儡，一切大权都操在司马昭手中，与其说是“背叛朝廷”，不如说是背叛司马昭更为恰切。钟会不但有用武之才，而且文才也很出名，他著有“道论”二十篇。

“钟夫人”钟琰，是一位封建社会女流的佼佼者。她是钟繇的曾孙女，西晋将军王浑的妻子。晋书说她：“聪惠弘雅（聪明贤惠，大方文雅），美容止（容貌美丽，举止窈窕），礼仪法度，为人所则（她熟悉礼节仪式、法规制度，为别人学习的标准）。”请看这位“钟夫人”，长得容貌美丽，举止窈窕，还会唱歌吟咏，而且又聪明贤惠，大方文雅，还熟悉封建礼节和规章制度，成了别人学习的楷模。在家庭关系中又能与妯娌们和睦相处，她与弟媳郝夫人之间，“雅相亲重”，谦虚谨慎，从来不以贵门自骄；郝夫人虽然家庭出身不如她富贵，但也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人称“钟郝”。世说新语贤媛传中说：“钟夫人之礼，郝夫人之法（法，在这里是守规矩的意思）。”“钟夫人”的行为果真如此，倒也值得如今的妇女们学习学习。

钟嵘，字仲伟，他是不是钟繇的后代，现在无从查起（钟繇是汉末魏时人，钟嵘是南北朝时人，相隔二百多年）。他也是长社（长葛）人。初为南宋侍郎，入梁后为晋安王记室。钟嵘精通周易和魏、晋、南北朝五言诗体，著名的《诗品》一书，就是钟嵘撰写的。《诗品》中列举魏、晋、南北朝能诗者一百零三人的诗作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品，一一加以评论。在每品之首，写有一篇概括性的前言，有助于读者理解其内容。在中国这是一部最早的评论诗品的著作，前人评价《诗品》，“妙达文理，可与文心雕龙媲美”。

写在后边的几句话

看待历史人物，应以历史的观点去看待。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上层建筑，都必然的为那一时期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制度服务。但是，作为上层建筑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讲，是有区别的。有人正直、开明、爱国、爱民；有人奸邪恶劣，祸国殃民。也就是说有些人对社会、国家和人民，起过有益的作用；有些人对社会、国家和人民，起过有害的作用。人类自从有

史记载以来，大体都存在好与坏两种人（不做坏事的也应该属于好人），后人根据这两种情况，去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。特别对那些于国于民起过美好作用的人，如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、医生、诗人等等，他们历来最受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。长葛钟氏家族中，钟皓、钟繇、钟嵘、钟琰等，他们都是学术名人，对人民有益无害（不等于他一点过错也没有）。我作为一个离休的长葛人（至少应该说是在长葛工作过的人），读了他们的传记和有关资料，心有所思，颇想把他们的有关资料汇集起来，让长葛人都知道古代长葛曾有许多对人类社会起过积极作用的人。遗憾的是敝人文史知识浅薄，又置花甲余年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好在我还有点余热，权将一知半解，当成一块碎砖，抛向长葛，希望它在长葛县能引出美玉来。

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

豫籍“三胞”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爱国力量

陈 瑞 松

河南省籍的华侨、外籍华人、港澳同胞、台湾同胞有五十三万人（其中侨胞及港澳同胞二十万人，台湾同胞三十三万人）。这对实现党的三大任务，振兴河南经济来说，是一个有利的条件，已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。可是，有一部分人，甚至是个别领导干部对此很不理解，说什么“河南历史上没有华侨。今天的所谓‘三’胞（指海外侨胞、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），没有几个好人，不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，就是南下学生、逃亡商人或地主；要是解放初期抓住他们，不枪毙也得判无期徒刑，现在却成为我们座上的贵宾啦！”这种极“左”的流毒不肃清，形而上学的观点不纠正，党的有关“三胞”方面的一系列方针、政策就不能得到落实。持有这种观点和看法的同志和领导，只看到河南籍“三胞”曾跟随国民党到过台湾和大

部分人仍在台湾这一事实，而看不到近四十年来，他们思想的变化和立场的转变。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已由过去追随国民党而逐步变为实现“一国两制”、拥护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力量。

说“河南历史上没有华侨”，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。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，较南方开化还要早些。据史书记载，中国人侨居海外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。周武王派箕子赴朝鲜，及秦始皇派徐福到日本求长生不老药，这是中国人侨居海外的开端。箕子是河南省商丘人，坟墓现在朝鲜；徐福是山东琅琊方士，坟墓现在日本。据传说，他们带的随从人员中大部分是河南人。另据历史记载，现在大部分闽粤人的祖先是来自中原迁徙去的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朝——固始的两次移民。就台湾省来说，更是如此。据一九五三年台湾进行人口普查的资料证明：在五百户以上的姓氏中，有六十三姓族谱材料说明其祖先来自河南，其中大多数来自河南光州固始，这些户占台湾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点九。所以，在闽、台常有“陈林半天下，黄郑排满街”的说法。现在海外

三千万华侨、华人中，从台湾、闽、粤出去的居多，而他们祖先的根大部分扎在河南。至于明、清以来，河南人出国谋生的就更多了。一九一五年法国在永城县一次招走苦工八百六十五人；一九三四年日本人在马来西亚开办铁山公司，在民权、睢县一次招走苦工一百二十多人。这些人中有的今天还健在。这怎能说河南历史上没有华侨呢？

河南省五十三万“三胞”中，除少部分是抗日战争以前出国的以外，大部分是在解放战争中新中国诞生前夕离开河南的。从人员构成来说，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军政要员和巨商富户约占百分之七左右，其余是军政界一般的员工、士兵、眷属和一大批青年学生。就其出走的原因分析，除个别人是当时出于和共产党势不两立者外；绝大部分人是由于听了反面的宣传而对共产党产生畏惧心理，再加上长官的挟迫而离乡背井的，并非真意与我为敌。我们的政策也没有把他们视为坏人，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争取、团结、教育工作。所以，“河南籍‘三胞’，没有几个好人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

新中国诞生以后，尽管工作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失误，都无损于她的伟大。事实告诉人们，历史上的中国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安定团结，繁荣昌盛。特别是近几年来，国家实行开放、搞活政策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，使那些出走台湾的同胞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种变化过程，可以简单总结为：由敌对而观望，由观望而惊叹，由惊叹而思归。曾任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一位老先生，最近给他的女儿（新乡卫校教师）来信说：“近来大陆开放政策，推行四化运动，工商突飞猛进，人民生活改善。我们虽在台湾，也是欢欣鼓舞。海峡两岸，不管哪边进步，都是中国的进步。最近两家航空公司的交往，打开民间接触的第一步，中国统一的脚步一天天地近了。听说台湾在大陆家乡的祖产可以发还，不由老泪纵横。请先打听归还祖产的可能性，以便回老家重整家园……。”我的胞兄也是一例。抗日战争时他官费留学美国，学成后曾服务于国民党空军，他回来探亲时说：听到祖国原子弹爆炸成功、卫星上天的消息，感到非常骄傲。以上的事实使我们看到，大陆的发展使他们的思想感

情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
中国人自古就有尊祖宗、恋故乡、爱祖国的传统，向往中华民族大统一。我们可以屈指算一算，当时四十岁左右离乡的人，现在差不多八十岁上下了；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，现在也已年近花甲了。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。他们离家的时间越长，思乡念亲的感情就越深。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、民主革命的先驱、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先生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在台北辞世时发出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”的悲歌，其思乡爱国之情跃然纸上，溢于言表。这代表了在台上层人士中老一代人的思想感情。蒋经国创建的青年军，在河南招了不少学兵。仅鲁山一带就有一千多名学生参加。那些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，如今也都白了少年头了。他们不能思念父兄及学友吗？！汤恩伯的十三军，曾较长时间驻防叶县一带。他的部下和当地姑娘结婚的就有一千多人。那些离家时正值“豆蔻枝头二月初”的少女们，如今也该是霜染两鬓的老太太了。他们能不思念爹妈及姐妹吗？！至于那些被抓丁和挟迫走的下层人员，他们思乡念亲的苦衷，就更可想而知了。

在痛苦难挨的相思中，盼望祖国和平统一，已成为“三胞”的共同心声。一位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人梅沧海先生，他叫长孙向华盛顿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递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余有所托，中国统一之日，台湾回归之时，诸位贤达，勿忘告余，余九泉之下，亦举酒为庆，共贺统一耳。吾民族应亲爱精诚，国共合作，共治吾国为盼。”还有人说：“今天我看到中国统一，明天死掉也没关系。”

为了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，我省在台人员对台湾当局的“三不政策”采取了不同的抵制手法。除海上民间贸易、中转信外，最主要的是千方百计脱离台湾。如借公务、贸易、观光、探访、治病、留学等，只要一离开台湾，就不再返回。其上层人士，也想方设法送子女出国定居，接着自己以探亲的名义离开台湾，然后再和大陆亲人公开通信，回国探亲观光。这种心照不宣的手法，在台湾形成了一种离心倾向。你影响我，我启发他。就象滚雪球一样，已使近二十万河南省籍台胞变成了华侨、华人和港澳同胞。

“三胞”在海外有广泛的联系，在实现

“一国两制”构想,和平统一祖国,开展引进、振兴中华的大业中,有其特殊重要的作用。关键是我们对待他们及其国内亲属采取什么态度。只要我们进一步肃清“左”的影响,不再把“海外关系”视为洪水猛兽,积极为他们落实政策,就能把海内外广大“三胞”及其眷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,工作局面就能进一步打开。例如,由台湾去美国定居的华侨赵先生,他是美国研制追踪导弹的专家,年轻有为。临颖县和许昌市为他家落实了政策,于是,他千方百计回到黄河大学任教,决心把他的知识贡献给祖国。据省侨务部门的不完全统计,海外侨胞、港澳同胞一九八五年向家乡的捐赠,折合人民币达二百六十多万元;与家乡有关部门进行贸易洽谈和科技交流,取得十四项成果,签订五十九项意向书,侨汇达到二百一十九万美元,占全省外汇收入的近一半。

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,凡是有“三胞”的地方,就可以听到盼望祖国统一的呼声。事实证明,消除隔膜并不难,最好的途径就是做沟通的工作。只有沟通才能了解,只有了解才能亲近,只有亲近才能认同,只有认同才能统